

总理网聊聊到了“农民养老”

【中国观察之鲁宁专栏】

2月28日,温家宝总理与全国网友在线聊天,我虽说没机会直接向总理提问,但十分在意面对网友所提出的几十万个问题,总理挑哪些来作答。

涉及“三农”的问题总理一共答了4个,其中两个一旦破题,受益面极广。

一是啥时候农民也能由社会养老?提问的网友是位西部农民。总理作答:“今年开始,农民养老保险制度要启动试点,力争当年在国内形成10%的覆盖面。”按常识,农民养老起步阶段的“托底资金”及日后推开后的“兜底资金”都得通过各级财政来注资,总理没有提及要投入多少财政资金,资金

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如何分切,起步阶段的养老支付标准是多少,但今年就起步,10%的覆盖面等硬指标,可不是闹着玩的。

农民养老在东部沿海省份的部分发达乡村已有不同程度的尝试甚至推广,虽说标准普遍低于当地城镇养老,但好歹每月都有一笔固定的养老金可领,老年农民生活境遇明显得到改观。

不过,这类尝试通常以村集体经济支付能力及乡、县两级财政补贴能力为依托,属于“土政策”或叫“地方粮票”性质,不具备国家制度层面的法制刚性。

而总理所承诺的农民养老,指的是改亿万农民由“养儿防老”为社会养老,系国家

层面的制度建设,一旦这张大网(譬如每年10%,分10年逐步编织)编织完毕,那在中国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二是农村教师待遇何时解决——提问的网友是名农村教师。农村教师的待遇难题分成两大块:公办教师与民办教师因身份歧视导致待遇差距过大令后者寒心,谓其一。按义务教育的法制硬约束,照说中国早就不该有所谓民办教师,但我查阅相关公开资料,目前除浙江省已切实取消民办教师外,其余省份均继续使用民办教师;其二、同为教师,省与省、县与县、乡与乡之间,收入差距都十分惊人。造成如是不可理喻之现象,最主要的成因在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相当一部分依赖县、乡甚至村自

筹,彼此财力上的差异导致教师待遇上的差异。

总理作答:“政府决定投入120亿元解决1200万义务教育阶段所有教师的工资问题,我讲的其实主要就是农村教师,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教师的工资不低于或者相当于公务员工资水平,我们在努力这样做,我们一定做到。”

一个是农民养老,另一个是农村教师工资,两件民生大事,总理都作了承诺。但笔者不能不指出,这两件大事能否办好,总理和中央决心固然令人鼓舞,但若地方落实打折扣,配套资金不肯足额投入,甚至截留挪用中央资金,农民和农村教师还将再次陷入失望。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期待“躲猫猫”加速看守所改革

■热点纵论

随着“躲猫猫”事件的真相大白,又有证据表明:两年多以前,同样在9号监室,另一个公民李荣林也是突然死亡。李荣林的亲人怀疑他也是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

(3月1日《重庆晨报》)晋宁看守所暴露出的“存在‘牢头狱霸’殴打押人员等监管不到位、管理混乱的问题”,其他地方的看守所也存在:2004年,15岁的中学生曹某在景德镇市第二看守所被同监室押人员殴打致死;同一年,嫌犯迟文滨在哈尔滨市呼兰区第一看守所内被“牢头狱霸”打死;2003年,被羁押在兰州市某看守所的嫌犯韩存德被同室“牢头狱霸”多次殴打后致死……这么多看守所悲剧绝非偶然,必定是相关制度出了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的规定,看守所隶

属于公安机关,必须由同级公安机关管理,因而在侦查、羁押、改造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下,很难做到中立。或许这才是看守所容易管理混乱的体制根源。

看守所只有中立才能维护被看押人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只有改变看守所的管理部门,才能真正保证看守所的中立,使看守所能与侦查部门“划清界限”而专司监管工作。这样还能有效防止刑讯逼供。由此,我们有理由期待“躲猫猫”事件能够成为看守所体制改革的一个催化剂。

去年11月28日,中央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了战略部署,看守所管理制度的调整就是其中一个方面:考虑将看守所的管理移交司法部(局)体系之下,让司法部门监督侦查机关的行为。

“躲猫猫”丑剧的发生,无疑放大了这一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感。(鲁湘)

广告法更该体现“代言担责”的理念

■热点纵论

全国人大常委会2月28日表决通过的食品安全法将于今年6月1日施行。

(3月1日《新京报》)食品安全事故多发,毫无疑问,这是一部令人寄予厚望的法律。食品安全法也的确解决了很多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老问题,比如说“多头管理”的弊端将由新成立的食品安全委员会来解决。在这部法律的诸多新规中,被媒体提到得比较多的,还有名人代言问题食品将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企业主要承担什么责任,做广告代言的名人,也很可能要承担相同的责任。北京电视台就“名人担责”这一条采访

了几位名人,受访都说今后接广告将更加谨慎。食品安全法威力初显,但愿名人吆喝问题食品时代就此终结。

“代言担责”的法律思维进入食品安全法,是消费者的福音,也是立法理念上一次大的提升。但名人代言的问题广告并不仅仅出现在食品领域,食品之外五花八门的问题广告也是屡见不鲜。“代言担责”的法律思维能否以进入食品安全法为契机,尽快体现在规范一切广告活动的广告法中,其实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现行广告法并未明确规定代言广告的名人要承担什么责任。只是在第三十八条中规定了广告主和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的法律责任:发布虚假

广告,欺骗和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

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发布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代言广告的名人身处广告法“无责特区”一旦出事,即便舆论压力巨大,往往也只是道歉或退还代言费了事。这样的事情见多了,不仅舆论感到很无力,连相关部门“不准名人代言问题产品”的三令五申都不起作用了。毕竟名人虚假代言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光靠道德约束,是很不靠谱的。现在食品安全法出来了,代言问题食品要承担连带责任,我想名人大肆吆喝问题食品的时代的确将一去不复返了,但

食品之外的其他领域呢,怎么来确保名人不帮着厂家忽悠消费者?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尽快修订广告法,将“代言担责”的理念嫁接进去。

自1995年2月1日起施行的广告法已经度过了十几个春秋,法律上的漏洞却让名人代言的虚假广告层出不穷,广告法已经到了应势而变的时候。近两年来,不断有学者和人大代表提出要尽快修订广告法,根据“虚假广告泛滥”的现状将“代言担责”的规定写入广告法。

此次食品安全法清晰界定了名人代言问题食品所需承担的法律后果,让“名人代言”再度成为舆论焦点,这实在是广告法顺势契入“代言担责”理念的最好时机。(正荣)

信息保护不能与舆论监督冲突

■公民发言

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增加了严打泄露或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3月1日《广州日报》)

除了保护个人隐私权之外,修正案再次将新闻伦理的矛盾之处显现给我们:一方面是个人隐私权,另一方面是人们对公共人物私生活的知情权。为了监督公共人物,公民个人及媒体可能利用一些非法获得的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刑法该如何去从?如果将这样的揭露行为视为非法,则公众的监督将永远不可能实现,对于

公众人物严格的不适当的隐私保护,将使得权力失去控制。

正如《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法官所阐述的那样:有关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不是公共人物免于媒体监督的保护伞,即使是公共人物的隐私,媒体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可以披露。

所以我们必须明白,隐私诚然需要保护,但如果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于公众人物的隐私,则应该恪守“实际恶意”之原则,而不能以“形式上的恶意”阻碍媒体合法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权力受到有效的监督,才不至于缩小舆论监督的空间。(邹宇翔)

苏州一民警业余时间助人寻亲,4年多来让23个家庭团聚

流浪18年后 她的“坟”上长满了草

【故事一】 回到家,家人居然给自己造了坟墓

2008年12月的一天,刘普云摔倒在张家港街头,病倒在街头的刘普云被民警及时送到了张家港市救助站,救助站又把她送到了医院。刘普云的智力明显有问题,问她什么问题,都不开口,这该如何是好?救助站的负责人是陈晓军的朋

友,早就听说陈晓军在寻找失踪人口上有一套好办法,于是把他请过来,寻求帮助。“她对别人很戒备,估计常年在外边讨饭,受尽了欺负,看见我们靠近,就很惊慌地喊叫:‘走!走!’”陈晓军尝试着和她沟通:“你是哪里人啊?叫什么名字?”刘普云抬起头,看了看陈晓军,嘴里含糊着发出几个音节:“六安,五老湾。”刘普云的话语中,明显带着河南的

口音。陈晓军尝试着用河南的口音问道:“知道驻马店吗?”刘普云的眼睛亮了一下,“知道。”

“那你住哪里啊?”“信阳。”

有戏!陈晓军立即追问,“信阳哪里?”

刘普云又挤出了两个字:“罗山。”但陈晓军对这个地方不熟悉,于是,在纸上写了个“罗”字,又在后面打了个问号。哪料到,看到这张纸后,刘普云突然笑了。“你会认字?”陈晓军有点惊喜。他把纸和笔递过去,刘普云接过来写下了两个字:“萝卜。”写完,她对着这两个字呵呵笑。接着,她的思维又紊乱起来。

陈晓军登录公安网,搜索了一下,发现在罗山有一个叫东铺镇的地名。“东铺,铺和卜在河南口音中是一样的,那合起来不就是萝卜吗?”

陈晓军用还算地道的河南口音跟她问候,“你是东铺的吧,你叫什么名字?”

但刘普云摇摇头,显然记不得自己的名字了。陈晓军并不灰心:“你儿子叫什么名字啊?”刘普云还是不回答。“那你家里还有人吗?”

“刘普德。”刘普云突然从嘴巴里冒出了这个名字。

陈晓军立即到户籍系统查找这个名字。果然有刘普德这个人,而且家就在罗山东铺镇的五老湾大队。陈晓军打电话给当地派出所,请求他们的帮

助。“你们那有个刘普德,他的家人是不是失踪了?”没多久,当地派出所回话了,“是有刘普德这个人,他有个姐姐叫刘普云,但已经死了好多年了。”回话的这个人还告诉陈晓军,他们去打听的时候,还特地经过刘普云的墓,上面已经长满了杂草。通过这个信息回馈,陈晓军终于知道他面对的这个流浪女就叫刘普云。

春节过后,刘普云的丈夫和女儿从河南赶到了张家港。原来,刘普云患有精神病,18年前走失,她的丈夫在经过多年的寻找没有结果后,以为她死了,只好为她建了一个坟墓,每到清明节去祭奠一下。哪料到18年后,她竟然又回到了家。

【故事二】 “沉香”在38年后见到了自己的亲娘

1970年,武继富刚刚出生2个月,就被山东的一对夫妇收养。4岁那年,养母去世,武继富从此与养父相依为命。6岁的时候,他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直到20年后自己娶妻生子,他才决定去实现自己寻找亲人的愿望。2005年,武继富第一次踏上了寻亲之路。

但是,武继富只知道自己是被养父从江苏的常熟抱过来的,自己的生父叫王毛毛。其他的一概不知。武继富连续三次来到常熟,不过最终还是没能找到自己日思夜想的亲人。2007年年底,武继富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在“中国寻亲论坛”

上,用“沉香”这一名字发出了寻亲求助的帖子。

2008年年底,终于有人回应并留下手机号码。此人就是陈晓军。武继富被抱走的时候才两个月,显然不会有什么记忆。于是,陈晓军决定从武继富的养父那里打开缺口。

陈晓军和武继富的养父取得了联系,他开始帮助这位老人回忆。“你去抱孩子的时候,庄稼地里种的是什么啊?”因为陈晓军知道,“每个地方的农作物是不一样的,确定了一个大概范围后,我找起人来就方便多了。”

“棉花?水稻?油菜?……”

陈晓军一个一个地提示,但这位老人却想不起来了。

陈晓军没有放弃:“你去抱孩子的时候,是坐船去的,还是坐车啊?”

“没有坐船。”老人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但就是这个回答,却一下子缩小了陈晓军寻找的范围。“我对常熟很熟悉,他是坐车过去的,那肯定是在常熟的沙洲这一片。”

“那个地方有山吗?”

“有,有山,但很矮,才三间房屋这么高。”老人的回忆开始清晰起来。

这个回答更加缩小了搜索的范围。“常熟只有海虞和福

山一带有小山,那就好办多了。”陈晓军立即开始寻找福山有没有王毛毛这个人。他找到了一个已经死去多年的王毛毛,但是,他是一个五保户。“五保户是没有子女的,可以把他排除。”

随后,陈晓军又寻找海虞镇的“王毛毛”。在当地一个老支书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武继富想要寻找的王毛毛。但王毛毛也已经死去了好多年。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武继富的妈妈还活着,已经是87岁的高龄了。2008年的最后一天,武继富赶到常熟。“沉香”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亲娘。

■寻亲秘诀

寻亲就像破案 方言是个关键

陈晓军是张家港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民警,本来是在所里负责消防工作。年初,城中派出所还刚刚获得公安部授予的整改火灾隐患先进集体称号。陈晓军对此功不可没。原本负责消防安全的陈晓军帮助别人寻找失散的亲人纯属偶然。4年多前陈晓军帮助救助站的一位流浪人员找到了家,从此之后,他就和寻亲结下了不解之缘。4年多来,一共让23个破碎的家庭重圆。而在这23名受助人中,流浪人员就达到了16个。

陈晓军曾经在南京带过兵,对各地的方言都熟悉,而且,他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刑警,参与侦破了许多大案要案。这些特殊的本领,都让他在帮人寻亲过程中游刃有余。

“其实,找人就好比破案。”陈晓军说,他每一次帮人寻亲,都拿出了所有的精力,动用了他掌握的刑侦手段。有一些流浪者由于精神状态不好,提供的信息就需要他好好鉴别,以防止被误导,“这就像我们在审讯犯罪嫌疑人的时候,要对他们的供述进行辨别一样。”

同时,陈晓军还要通过勘查现场、复原旧貌、走访群众等多种刑侦手段,来慢慢寻找线索。



陈晓军(右)正在与寻亲者交谈